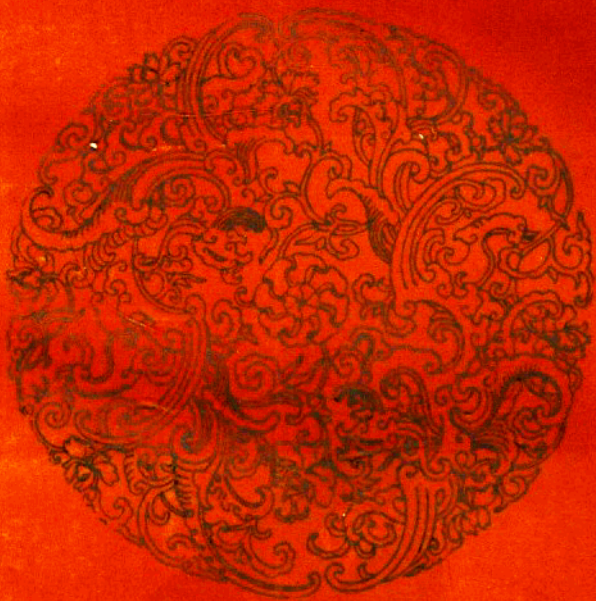


唐宋文學論札

羅時進 著



陝西人民出版社

时进将他的《唐宋文学论札》书稿送到我家里，嘱我写一篇序。书稿里大部分文章，过去我都看过，有些文章，他口头上跟我谈起过，因此，我对它们很熟悉，现在重新读来，感慨良深，心底油然而兴起一种很强烈的感觉。近几年来，社会上出现过遇事讲求经济效益的风气，知识廉价，学术贬值，甚至有少数同志更弦改辙，离开学术研究的岗位，而时进却丝毫不受这种社会思潮的干扰，依然奋进在学术道路上，孜孜不倦地耕耘着；在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里，也曾出现过把传统的与时新的、微观的和宏观的研究方法对立起来的议论和做法，时进却能辩证地处理这个问题，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探颐发微，创获颇多。《唐宋文学论札》一书，记录了他在学术道路上心不旁骛、专心致志地探索前进的心理历程。时进的精神是可嘉的。我记起苏轼的一首诗：“山茶相对阿谁栽，细雨无人我独来。说似与君君不会，烂红如火雪中开。”（《邵伯梵行寺山茶》）山茶花很鲜艳，雪中开放的山茶花更美。我赏爱“雪中开”的山茶花，于是，欣然命笔，应约写了这篇序言。

《唐宋文学论札》收录了三组文章，一组专论唐诗和唐代

诗人，一组专论唐诗人许浑，一组专论宋代诗词。这些文章，都是时进平时读书有得，逐步写成的，说明他涉猎很广，视野开阔，思路敏捷，钻研很深，研究的方法灵活多样，融通的学科丰富多采。综观全书，可以见出时进的研究作风有三个基本特征，非常引人注目。

首先，作风踏实严谨，重视原始资料，言必有据，考订精审，质疑证误，有扎实的基础。《许浑两拜监察御史考》一文，对许浑于大中三年任监察御史的旧说，提出疑问，并运用许浑《梁秀才以早春旅次大梁，将归郊扉，言怀兼别示，亦蒙见赠，凡二十韵，走笔依韵》诗的自注、岳珂《宝真斋法书赞》所载之许浑《乌丝栏诗自序》以及清刊《润州许氏家谱》存录之会昌二年敕监察御史诰命一道等文献资料，排比推勘，作出了许浑于会昌四年任监察御史、遭黜为润州司马、大中三年又拜监察御史的结论，论证精确，很有说服力。又如《许浑年谱简编》“大和元年”[考辨]条，论证许浑《和人贺杨仆射致政》诗之杨仆射为杨于陵，据《旧唐书·文宗纪》认定杨于陵以右仆射致仕在大和元年四月。又引王定保《唐摭言》卷三“杨仆射宴新昌里第”条和白居易《和杨郎中贺杨仆射致仕后杨侍郎门生合宴席上作》诗，证明许浑诗中的杨仆射就是杨于陵，其时许浑正在长安。同时，还据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六《唐许浑乌丝栏诗真迹》载录之《和人贺杨仆射致政》诗，辨证清人汪森所编集的汪元量《湖山外编》误收许浑此诗，错将唐诗作宋诗，进而又指出了孔凡礼辑校《增订湖山类稿》的错误，因为孔氏将许浑诗编入《类稿》卷三，并认为杨仆射即是汪元量同时人杨居宽，错将唐人作宋人，这就使学术界的有关讨论更加扎实。像这类考订

周详，言之凿凿的例子，在整个书稿中，是很容易找到的。即便在那些理论色彩比较重的论文中，他也从不轻忽材料的鉴别工作，这表明时进的研究态度是非常审慎、严肃的。

其次，抓住一点，向深度、广度生发，拓展开来，深入下去。时进常常把一篇作品、一个问题、一种文学现象，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进行理性的推演、判断，因而能以小见大，从个别见到一般，由现象升华到规律，颇具理论深度。例如《韩翃〈寒食即事〉寓意辨误——兼论唐代寒食清明风俗及其文化意义》，文章的题目并不大，仅仅以韩翃的一首诗为论说对象，但是，把它和唐代寒食、清明节“冷食”、“赐火”、“禁火”、“改火”、“祭扫”、“邀春”等一系列习俗联系起来考察，就不难发见，昔日人们对《寒食即事》所作的“托讽深远”的评说，完全缺乏历史根据，远离了唐人的风俗文化意识、唐代士大夫中和的政治理想，自然也就无法理解唐德宗赏识这首诗的审美情趣和潜在心态。又比如，宋代的元宵词是大家司空见惯的作品，而《原生态意识与时代性心理的交汇——宋代元宵词文化生成机制探讨》一文，把元宵词和宋人典籍里关于元宵节的记载观照起来，又追踪了汉代元宵节的狂欢仪式，进一步又联系到外国的深受民族学家重视的放荡节，从而作出了宋代元宵词是放荡风俗中的原生态意识和悖逆礼俗的时代性文化心理的交汇和整合的结论。从元宵词的情爱主题、性感描写中，看到了宋代文人的双重性格，宋代诗文中弘扬儒学道统而在词作中充满艳情私欲这种怪异的文学现象，看到了宋人元宵词的文化生成机制。

再次，坚持多元化的思维方式，加强多学科交融，运

用多种研究方法，深化唐宋文学的研究，多视角、多层面地探讨唐宋诗词研究中的许多问题。时进很重视传统的研究方法，像《唐诗异文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价值》、《〈登幽州台歌〉献疑》，从版本、校勘的研究手段切入，针对陈子昂《登幽州台歌》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著名诗作的旧说和唐诗的整理工作，发表了很有意义的见解。又如“许浑诸考”，用考订、证史等传统方法，详尽地论证了许浑的世系、籍贯、历仕、交游、创作活动，弄清了许多尚待解决的疑点，为许浑研究的深入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我们又高兴地看到，时进能突破传统领地的樊篱，多方面地吸收学术新成果，借鉴新的研究方法。他注意引用考古成果，《许浑的家世和籍贯考》一文采用了1982年镇江市丁卯桥窖藏的考古材料，论证许浑确为“圉师之后”。《韩翃〈寒食即事〉寓意辨误》根据1978年湖南隋县自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发掘出土的绘有二十八宿星图的箱盖实物，说明古人早在战国时代已经形成了二十八宿的天象认识。他也注意吸收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根据青年和妇女的心理特征，探析了王昌龄、李益的边塞诗和朱淑真的“断肠词”，从诗人的深层心态着手，准确地把握了这些诗人的艺术风貌，显示出作家研究的新成果。《许浑千首湿与他的佛教思想》、《翰墨滋润、别为风调——试论许浑诗的艺术特色》等文章，将诗学研究与佛学研究融通起来，阐述了佛教思想渗透入许浑的哲理意念和审美意识中，极大地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形成许浑诗“千首湿”的艺术特征。《王昌龄与李益边塞诗的比较探析》一文，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探索分隔着“安史之乱”这个历史分水岭的盛、中唐诗人王昌龄和李益的边塞诗，研究它们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以及形成这

些异同的社会原因和心理特征，从中找出文学发展的内在联系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时进将文化学和民俗学引入唐宋诗词的研究中来，作出新的探讨和有益的尝试，《韩翃〈寒食即事〉寓意辨误——兼论唐代寒食清明节风俗及其文化意义》、《陆游〈游山西村〉诗旨发微——兼说唐宋社日节俗》、《原生态意识与时代性心理的交汇——宋代元宵词文化生成机制探讨》等文章，便是他近年来倾注很多精力和心血的结晶。

正因为时进的研究工作具有以上这些基本特征，所以他的书稿才能呈现出众芳竞秀、异彩纷呈的面貌，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时进时时进，我衷心祝愿他学殖时时增进，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在未来的岁月里，获得更多的学术研究新成果。

吴企明

一九九一年七月三日

目 录

序 言 吴金明

对陈子昂研究中几个基本问题的再认识 (1)

《登幽州台歌》献疑 (22)

王昌龄与李益边塞诗的比较探析 (28)

李白爱情诗鉴识 (42)

“诗史说”评议 (58)

韩翃《寒食即事》寓意辨误

——兼论唐代寒食清明风俗及其文化意义 (76)

杜牧《自撰墓志铭》探微

——兼论作者卒年问题 (88)

唐诗异文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价值 (101)

许浑千首湿与他的佛教思想 (123)

翰墨滋润 别为风调

——试论许浑诗歌的艺术特色 (139)

许浑生年考 (152)

许浑家世籍贯考 (157)

许浑南海之行考·····	(168)
许浑宦游宣州考·····	(179)
许浑南亭诗考	
——兼论许浑对牛李党争的态度·····	(188)
许浑两拜监察御史考·····	(194)
许浑行迹考略·····	(201)
生命运行的真实轨迹	
——简论范仲淹诗歌的伦理倾向·····	(249)
陆游《游山西村》诗旨发微	
——兼说唐宋社日节俗·····	(263)
一个罕见的女性形象	
——宋代作家朱淑真论略·····	(269)
论辛弃疾的隐逸及其隐逸词·····	(285)
原生态意识与时代性心理的交汇	
——宋代元宵词文化生成机制探讨·····	(302)

对陈子昂研究中几个 基本问题的再认识

在唐代文学家中，陈子昂是很得殊荣的，不仅生前名震遐迩，逝后也深受推崇，延誉千载。与他生前有“忘形之契”的至交好友卢藏用最早撰《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盛赞：“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其后，李、杜、韩、柳皆有弘扬，宋后名人尤多奖饰，乃至胡震亨、沈德潜以“此为陈、广”，“大泽一呼，为群雄驱先”^①冠诸唐代诗史。相沿而下，陈子昂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其诗歌筚路推轮的功绩进一步被认同和发挥。现今的文学史书和学术界都普遍把陈子昂作为唐代诗坛上首先树起文学革新旗帜的“旗手”，理论和实践上为盛唐诗歌繁荣开辟道路的“拓荒者”。然而，如果我们把这一论题的研究还原到最初的起点，而又不囿于成见地在可能发掘的材料中重新进行一番考察的话，我们认为现有的一般结论有偏颇失据之处，继续作一些探讨是必要的。现就陈子昂研究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发表一些看法，就教于学术界前辈方

家。

一 唐人眼中的陈子昂形象

现有的文学史和评论都援引了唐人论及陈子昂的资料，突出论证“诗人陈子昂”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所做出的贡献和巨大影响。但是，由于许多研究者片面地取舍和理解一些材料，未免模糊甚至误解了文学家陈子昂全人。全面地理解“唐人眼中的陈子昂形象”，可以使我们比较清楚地把握当时人对陈子昂原型形象的认识，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照。

大致说来，“唐人眼中的陈子昂”具有两个侧面：文章家、诗人。

陈子昂的文章现存一百二十多篇，生前所写的则远远不止这些。卢藏用《陈氏别传》说：“其文章散落，多得于人口”，可见当时已有佚失，如《江上人文论》等，子昂“遭家难亡之”，今不能复见。尽管如此，他传世的文章数量也几乎与诗作相等了。对于文章家陈子昂，唐人极其推崇。卢藏用为其文集作序，高度赞扬子昂“崛起江汉，虎视函夏，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非夫岷、峨之精，巫、庐之灵，则何以生此！故其谏诤之辞，则为政之先也；昭夷之碣，则议论之当也；国殇之文，则大雅之怨也；徐君之议，则刑礼之中也。”卢《序》在当时影响很大，曾使得《陈子昂文集》如“太冲之词，纸贵天下”。^②但是其后不少诗话和绝大部分文学史书和评论文章都把“崛起江汉”云云作为时人的意见用之于陈子昂诗歌地位的评鹭，形成了一个相沿已久的

误解。但以卢氏以上数语作诗论至少有三处扞格不通：

(一) 与卢《序》内容不符。在《序》所历数的佳作中，诗歌只提到了《感遇》之篇，其它均为文章。“谏诤之辞”是指《谏灵驾入京书》、《谏理政书》、《谏用刑书》等“其立言措意，在王霸大略”^③的文章，“昭夷之碣”指《昭夷子赵氏碑》，“国殇之文”指《国殇文》，“徐君之议”指使当时朝中之士所服膺的著名疏状《复仇议状》。^④“为政之先”、“议论之当”，“大雅之怨”，“刑礼之中”这些都是对“崛起江汉”等赞词的具体申发。接着，卢氏以“至于”连接，旁转一面赞赏《感遇》之诗。而在《序》的结穴处，他却深深慨叹子昂当时“不得列于诗人之什。悲夫！”如果“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是对子昂诗而言的话，则绝无“不得列于诗人之什”之理。无疑，这里是就陈子昂的文章而言的。

(二) 与本事不符。卢氏上述赞词在《陈氏别传》中有本事可据。嗣圣元年，唐高宗皇帝崩于洛阳宫，灵驾将西归长安，子昂以布衣献书阙下，以国计民生谏止。时武则天以太后摄政，览其书而壮其言，召见问状。见子昂貌柔野，少威仪，然言王霸大略，君臣之际，十分慷慨激昂。乃敕曰：“梓州人陈子昂，地籍英灵，文称玮晔”，擢为麟台正字。“时洛中传写其书，市肆闾巷，吟讽相属，乃至转相货鬻，飞驰远迹。”大历元年赵儋所撰《旌德碑》亦云子昂诣阙上书谏灵驾归京，“由是海内词人靡然向风，乃谓司马相如、杨子云复起于岷、峨之间矣”。可见子昂一举成名，使“天下翕然”的是他的文章而不是诗歌。

(三) 与史书所称不符。《旧唐书·陈子昂传》云：子昂

“数上疏陈事，词皆典美”，“子昂偏躁无威仪，然文词宏丽，甚为当时所重”。《新唐书·陈子昂传》亦云：“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子昂所论著，当世以为法。”这些史论，都可作卢氏上述之论的注脚，说明陈子昂在当时不是以诗人，而是以文章家受世人宗仰。

初唐，“四杰”的文章写得才思勃发，词采富赡且寓有俊逸清新气息，始与齐梁堆花丽叶、施脂抹粉，略无生气的文章判袂，但在文体上仍然全部用骈四俪六。陈子昂的文章不但以文辞取胜，而且开始了文体改革，破骈为散，力矫齐梁，成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光辉先导。天宝以还，萧颖士、李华等主盟文坛。他们出于忧国，针对时弊，倡导复兴儒教古文，举的就是陈子昂这面旗帜。萧颖士尝与人指点文坛，推许陈子昂的文章是初唐“可当世者”^⑥。李华为萧颖士文集作序，亦称“近日陈拾遗文体最正”。梁肃在《左补阙李翰前集序》中说得明白：“唐有天下几二百载，而文章三振：初则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次则燕国张公说以宏茂广波涛；天宝以还，则李员外、萧功曹、贾常侍、独孤常州比肩而作，故其道益炽。”德宗朝至宪宗元和中兴，出现了旗帜更加鲜明，影响更加广泛的古文运动。当韩愈、柳宗元所领导的这一运动取得光辉成就的时候，他们没有忘记陈子昂作为先驱者的勋绩。韩愈《荐士》云：“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柳宗元《杨评事文集后序》云：“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兹二者，考其旨义，乖离不合，故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专美，命之曰艺成，虽古文雅之盛世，不能并肩而生。唐兴以来，称是选而不作者，梓潼陈拾遗。”这些论述，历来也被不少文学

史家和诗歌研究者写进论著或文章，作为放在陈子昂诗歌地位上的又一个重要砝码。然而，对柳文理解显然失之牵强。“比兴”并非诗的专有之义，更非诗的代名词。细审柳《序》，便可知宗元独称其文，语不及诗。对韩诗的理解则失之片面。以《送孟东野序》“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其存而在下者，孟东野始以其诗鸣”数语参证，可知“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绝非特誉其诗。宋人员兴宗在《陈子昂韩退之策》中尝云：“不知者，以退之倡古文于唐，知者以为无陈而无以为之也。……盖子昂之文，惟正则取，不正不学也。然则相承而至退之，亦其有力哉！故退之亦畏之，盖尝曰：‘唐兴，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杜甫、李白，皆其善鸣者’，此之谓也。”这一辨证，疏理出唐代古文运动的源流，不但可以笺证《送孟东野序》，亦可解开“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的疑窦。其后，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三十一）、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都明确地把韩柳《荐士》与《杨评事文集后序》中的论述作为唐人评论陈子昂文章的重要观点，可谓不负韩柳，亦不负陈子昂的文章卓绩。

如果说在唐人眼中，“文章家”是陈子昂形象的一个鲜明生动，富有气度和魅力的主要面的话，“诗人”则是他的一个侧影。终唐之世，陈子昂的诗歌常常被提起的只有一组《感遇》诗。“初，为《感遇诗》三十八章，王适曰：‘是必为海内文宗。’”^⑥但他的诗在当时并没有什么影响，甚至“不到列于诗人之什”。开天期间，唐代社会由繁荣的顶点急遽落入动乱的深谷，在这一政治转折所孕育出的复古思潮中，文章家陈子昂成为古文家的旗帜，诗人陈子昂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李白以道家之情与之沟通，比其为“麟凤”；^⑦杜甫以忠义之心与之撞击，叹赏“《感遇》有遗篇”。^⑧一些诗人在创作中注意学习他的不拘声律的五古。如李华拟《感遇》之体作《咏史》、《杂诗》，孟云卿猎其伤怨之感写怀古伤时的古调^⑨，苏涣取其讽刺之意为变体律诗^⑩。但是，他们的创作本身并没有取得较高的艺术成就，产生较大的影响，更不能为陈子昂张目。大历以降，战争的混乱刚刚结束，诗人们心灵的震撼稍稍平息，当他们把诗歌从“残害为异物，寒月照白骨”的战场带到了“旧业已随征战尽”的“芦花浅水边”时，便开始了新的回顾、思考、探索。同时，开天之际出现了倡古尚质、讲究声律词章，标举高格远调等不同艺术追求的创作实践。在多种镜鉴中，他们站到新的高度重新思考“风雅”的艺术意义，从内容、形式、表现方法等各方面对陈子昂的诗歌进行了批评。如陈儋指出子昂只“有诗十首入正声”。^⑪元稹声称幼时对子昂《感遇诗》吟玩激烈，拟其诗作，深得怜奖。久之得杜甫诗数百首，相比之下便“讶子昂之未暇旁备矣”。^⑫皎然更云“陈子昂复多而变少”“则陷于相似之格，其状如驽骥同厩，非造父不能辨。”^⑬晚唐，唐帝国大鼎危岌，天下各路共问之。整个社会仿佛是一座岩浆沸滚的火山。在一些诗人曼吟着暗淡低沉的末世哀音的时候，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等人却用中唐“惟歌生民病”的现实主义光彩照亮了诗坛一隅，陈子昂也被看作初唐“出没二雅，驰骤建安”，“扫荡词场，廓清文祲”^⑭的祖师被仰慕，杜荀鹤甚至以“诗有陈体，可以润国风，广王泽”而于许多进士中“拔居上第”，^⑮子昂诗的身价再度得到提高。

总的说来，在唐人眼中，陈子昂的文学成就主要在于文

章而不是诗歌。他首先是一个杰出的文章家，然后才是一个诗人。其文章家的地位是建筑在为后来的古文运动作先导的一系列论事书疏和一部分表序碑祭作品基础上，而诗人的地位则主要和《感遇》联在一起。前者在终唐之世都深得宗仰，后者则随着社会内部矛盾的激化和文坛意向的转移而看涨见落。当然，对于“唐人眼中的陈子昂形象”我们可以进行重新研究和评价，但借鉴这一“形象”时，如果只看到“诗人”这一侧面而忽视“文章家”的主要面，就不能不说是认识上的片面了。

二 《修竹篇序》的理论建树

在几乎所有关于陈子昂的评论中都十分强调他的《修竹篇序》在诗歌革新理论方面的建树，给予极高的评价，把它看作“对齐梁诗风的扼制”^⑧，“在七世纪末期，成为有意识的觉醒，树立文学革新的旗帜”。^⑨许多论者涉及这一问题，往往把四杰和整个初唐诗坛都作为陈子昂的铺垫和衬托，有的干脆连这些铺垫和衬托都抽掉了，誉之为“唐诗革新的第一声春雷”^⑩，这样，陈子昂就成了“唐代最早起来反对绮靡文风的人”了。^⑪这种评价并不符合实际。

我们先来看一下《修竹篇序》全文：

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

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炼，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解君云：“张茂先、何敬祖、东方生与其比肩。”仆亦以为知言也。故感叹雅制，作《修竹诗》一篇。当有知音，以传示之。

这篇序，全文共一百六十九字，开头尊称及叙述写作缘由的所占过半，常常被人们引用的文学观点只有六七十字。主要是通过批判六朝文风，肯定从“诗三百”到“正始”的诗歌进步传统，倡导风雅寄兴和建安风力。正如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⑧我们评价陈子昂诗歌理论的建树如何，根据不是别的，也正是看它是否具有或具有多少新的内容。

开皇九年，隋平陈，结束了南朝统治，统一了中国。在朝代的兴废中，兴起的一代总是以前代灭亡的历史教训作为殷鉴。摆在隋代统治者面前的是荒淫腐朽的政治与追求娱乐消遣，崇高绮靡淫艳的文学连在一起，造成意识的颓废，精神的糜烂，社会的崩溃。这是一个血淋淋的亡国教训。为永保皇祚，他们不能不对绮靡文风保持高度警醒并从各个方面加以防范。过去一些北朝有识之士对南朝文风自发的批判这时成为新兴政权巩固其统治的自觉要求。文帝曾屡下敕文，要求废新变，以正声制乐，并早在开皇四年就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与这一统治要求相适应的理论便应运而生。最有代表性的是李谔的《上隋高祖革文华书》：

……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

以安邦治国的面貌出现，这种理论一开始就具有了对六朝文风强烈的批判色彩，文章中还抨击了“学不稽古，逐俗随时，作轻薄之篇”的时风，则触及到了以复古改变文风的问题。王通在《中说》的许多篇章中，则不止于斥声律词华为“文章末流”，否定六朝文风，而且明确提出“学者博诵必贯乎道，文者苟作必济乎义”。这在理论上提高了一步，已开中唐古文家“文以载道”的先声。然而，这一时期虽然对六朝绮靡文风的批判是非常激烈的，但更多地出于人们对南朝灭亡的直观感受，而对文学自身特点和社会作用还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对如何疗救文风颓靡的弊病，认识更加浮泛。这是一个短命的时代和畸正相生的社会的必然局限，却正好给唐人留下了余地。唐人正是接前人之绪，又踩着他们重蹈覆辙的教训，更自觉地去突破前人。

在初唐文坛上集中着两支队伍：一支是以魏征为代表的宫廷作家，一支是以四杰为代表的走向民间的作家。他们都旗帜鲜明地对六朝文风进行批判和否定。魏征《群书治要序》云：“近古皇王，时有撰述，并皆包括天地，牢笼群有，竞采浮艳之词，争驰迂诞之说，骋末学之博闻，饰雕虫之小伎，流宕忘反，殊途同致。”《隋书·文学传序》云：“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制，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